



本·奥克里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里：

# 复原非洲形象 探讨非洲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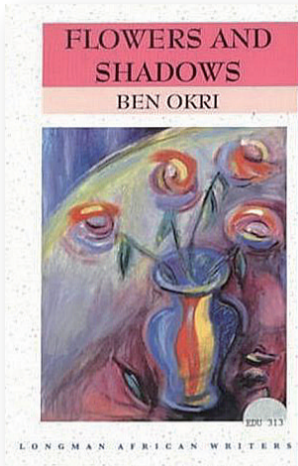
□朱振武

近年来,非“主流”英语文学渐成主流,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非英国家英语文学虽起源于英国文学,但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刻画地域生活、书写民族历史以及彰显多元文化等诸多特点。其中,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是非洲英语文学的典型代表,作为非洲的发声者,非洲作家用英语刻画出生动而真实的非洲形象。踏着图图奥拉、索因卡以及阿契贝等第一代尼日利亚作家的足迹,作为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代表的本·奥克里,以其独特的非洲美学,凭借小说《饥饿的路》向世界呈现出一幅虚实交融、气势恢弘的非洲画卷,实现了对非洲精神的文学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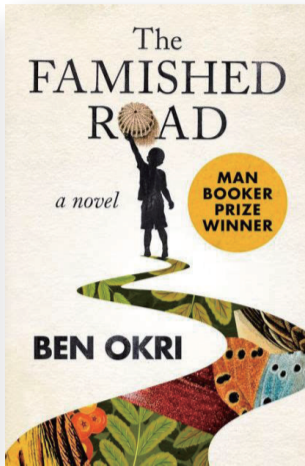
本·奥克里(Ben Okri,1959-)用英语写作,被认为是非洲最重要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尼日利亚中西部城市明纳,两岁时随父亲搬到纽约,9岁时回到尼日利亚。19岁时重返英国并在艾赛克斯大学研修比较文学。21岁的时候,他凭借处女作《花与影》(Flowers and Shadows,1980)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之后,又凭借《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1991)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成为最年轻的布克奖获得者。他还获得过英联邦国家非洲文学奖和阿加汗小文学奖等其他重要奖项。他的作品《饥饿的路》与《迷魂之歌》(Songs of Enchantment,1993)以及《无限的财富》(Infinite Riches,1998)构成了以“鬼孩”阿扎罗的生活缩影反映战后尼日利亚以至非洲社会与政治动荡局面的三部曲。

## 奥克里笔下的非洲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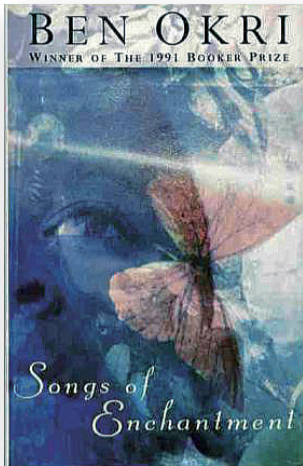
基于诸多历史原因,白人作家的非洲形象描写引起了读者对非洲形象理解的偏见。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乔伊斯·卡里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等都先后对非洲形象做出过或多或少的不实描述。英国作家乔伊斯·卡里曾以尼日利亚为背景创作出《艾萨得救了》《非洲女巫》和《约翰逊先生》三部小说。其中,《约翰逊先生》曾被认为是最好的尼日利亚小说。对此,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阿契贝就曾指出“我们讲的故事绝不能为外人道”。阿契贝认为主流的英语小说对非洲的描述“大部分是情节简单的故事,有着善良的白人和邪恶的野蛮人”。无独有偶,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其代表作《黑暗的心》中曾对非洲形象进行了“非人化”描述。“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盘腿坐着两把瘦棱棱的黑骨头。其中一个把下巴撑在膝盖上,视而不见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同在的另一个幽灵则是前额浮在膝盖上,仿佛被一种极度的困倦所压倒;四周散开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恰像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对此,阿契贝以《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脏)中的种族主义》为名,提倡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新形象。



《花与影》



《饥饿的路》



《迷魂之歌》



《无限的财富》

在阿契贝等先驱作家的影响下,奥克里在《饥饿的路》中呈现出真实的非洲风貌速写,贫穷的非洲生活特写以及落后的非洲人民之声,并通过机器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政治给生活带来的混乱和白人非洲人民生命的迫害,还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非洲形象。奥克里对非洲形象的刻画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典型范式的非洲形象。通过对非洲的传统食物、祭祀活动以及具有显著地方性的非洲风俗迷信等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奥克里揭开了非洲形象的神秘面纱。非洲人的生活贫穷落后,但并非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阴影”,非洲大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并不是殖民者开采自然资源的目的地。非英国家英语文学以崭新的人物形象和民族形象颠覆了以往白人作家笔下黑人的刻板印象,并从黑人作家的视角刻画出白人殖民者的真实形象,从而打破了被英美文学长期垄断的局面。

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开始,非洲作家的写作方向便从重现历史转向了揭露深刻的社会现实。奥克里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出非洲原貌写生图,从而颠覆了以往现代西方世界眼中原始野蛮的非洲形象。西方殖民人侵犯原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非洲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生产模式由传统的农业转向务工。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对西方政治体制的邯郸学步并没有使他们实现民主,也没有使人们摆脱饥饿与贫穷,反而造成了权力之争。与白人作家笔下“非人化”的黑人形象不同,奥克里真实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伪善与残忍,呈现出一个贫穷落后的被殖民荼毒后满目疮痍的非洲形象,揭露了殖民者利欲熏心、残酷无情的卑劣行径,表达了对非洲人民悲剧人生的深切同情。

## 奥克里笔下的非洲梦

非洲作家肩负着非洲民族书写的重任,对古老非洲梦的建构体现了非洲作家的民族情怀。在《饥饿的路》中,奥克里将约鲁巴民间传统的神话传说通过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了以幽灵世界、梦境世界和多重幻像相融合的虚幻空间。通过幽灵世界的美好和梦境世界的预言表达对原始非洲梦的坚守和对未来非洲梦的憧憬。



《迷魂之歌》



《无限的财富》

“在我成长的传统中,对现实有着多维度的解读,其中包含着神话、传说、祖先、灵魂与死亡。”奥克里说。在非洲,死者的灵魂可以借助动植物等重返人间,并通过梦境等征兆影响现世的人们做出选择,帮助其脱离危险。《饥饿的路》中,幽灵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净土,象征着非洲人对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与依附。幽灵世界的贤王象征着非洲祖先;鬼孩阿扎罗象征着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贤王在冥冥之中给阿扎罗提供的保护,体现出古老文明对新生国家的指引与帮助。通过幽灵世界中贤王对阿扎罗的多次指引与庇护,奥克里实现了对古老非洲梦的回望与追溯。“非洲神话是非洲文化艺术的土壤,它不但培育了非洲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而且孕育着一种非洲民族精神。”(李永彩)奥克里在《饥饿的路》中借鉴了许多古老的非洲神话传说,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关于“路之王”的传说。这个神话传说正是“饥饿的路”的由来。路之王是贪婪的统治者的化身,从西方殖民统治到各路政党统治,非洲人始终无法摆脱统治者贪婪的血盆大口。统治者不断索取,导致了人们一直无法摆脱饥饿的命运。阿扎罗是非洲古老文明和西方文化双重浸润下的结合体,爸爸是阿扎罗的守护神,因此奥克里通过爸爸的梦境来预示非洲未来的出路,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的非洲梦的憧憬与探索。

幽灵世界、神话传说以及梦境与幻像等具有浓厚的约鲁巴文化色彩,呈现出一定的魔幻性。奥克里将民间宗教、民俗和口头神话与原始传统文化的巫术、仪式、文化遗存和符号结合,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虚幻空间,象征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在发展中对古老非洲梦的坚守和未来美好

非洲梦的憧憬。在这条艰难的诞生之路上,古老的文化与传统仍然是非洲人民的信仰所在。他们坚持着自己原始的非洲梦,相信祖先可以庇护他们。同时,他们又期待着未来美好非洲梦的实现。然而,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面性。对非洲部落传统的偏执坚守会导致故步自封和愚昧落后;西方殖民人带来破坏的同时,也有着先进文化影响的一面。多元文化可以弥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

## 奥克里笔下的非洲路

殖民前的非洲之路是一条“饥饿的路”。随着殖民入侵,对原始之路的继承与对西方殖民的模仿并未使新生的尼日利亚走向理想之路。长期被殖民的历史,使非洲处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环境中,因而形成了一个杂合体。《饥饿的路》中,奥克里通过寇朵大婶的分叉之路、爸爸的迷官之路和阿扎罗的循环之路来探寻民族的出路。

新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文明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人。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殖民的双重影响下,非洲的未来之路走到了迷茫的分岔口。寇朵大婶的分叉之路体现了一部分非洲人逐渐摆脱非洲传统,开始接纳并崇尚西方殖民文化的过程。寇朵大婶在杂糅的第三空间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文化认同的失衡让她在分叉之路上渐渐走向了文化边缘的尴尬窘境。

阿扎罗的爸爸代表了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由务农到佣工,在阶级剥削和殖民影响的双重重压下忍受着不公和屈辱的非洲底层人民。在《饥饿的路》中,他走了一条迷官之路。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杂糅的尼日利亚发生着巨大而快速的变化,原本简单的路也变得错综复杂。非洲人民对未来出路的探索也一度迷失于混乱中,未来的出路像迷官的出口一样难以寻觅。西方殖民的机器、原始文明的毒药以及政客与百姓的自私都会给非洲家园带来毁灭。人们要想摆脱当下充满饥饿、贫穷、暴乱的路,就要打开心门,用新的目光打量世界,尊重一切生灵,不滥用权利,既不走愚昧落后的路,也不走腐败贪婪的路,坚持爱与正义,为陷入苦难的非洲找到出路。

阿扎罗的循环之路反映了生命的周而复始,这与非洲传统的生死观不谋而合,万事万物都在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阿扎罗的漫游经历就是对非洲原始之路的怀念惋惜,对非洲现实之路的深切体会以及对非洲未来出路的摸索探寻。固守本土文化与抵制西方文明并不会摆脱饥饿的路,只有保留本土文化的精华,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为未来之路找到出路。

奥克里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结合尼日利亚悠久的历史、异域的文化、民族特色和日常生活,并通过英语这一文字载体呈现了非洲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弘扬了非洲精神,完成了民族精神的书写。他真实刻画出殖民前原始的非洲形象和具有西方殖民烙印的非洲形象,打破了白人作家笔下刻板的非洲印象,改写了白人作家笔下非洲大地是蛮荒之地,非洲人是野蛮人的偏见,从而打造出了丰富多元的非洲形象。借幽灵世界、梦境世界以及非洲神话传说来完成古老非洲梦的追溯和未来非洲梦的憧憬。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与碰撞中,以个人出路的摸索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非洲路的探索。通过对非洲原始文明之路的回望与坚守,对非洲现实之路的揭露与抨击,以及对非洲未来出路的思考与探索,并结合多样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完成了对发展中非洲的书写。

# 莎士比亚的植物隐喻

□翟 灿

雨果在《莎士比亚传》中形容莎翁作品:“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百鸟在歌唱,灌木在抽叶,人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云彩在游荡,天气时冷时热,晨钟暮鼓,朝发夕至,森林窃窃私语,人们促膝交谈。”莎翁作品中不仅人物有丰富精彩的台词,世间万物都仿佛具有灵性。各式各样的花卉、草木和果蔬,这些植物在莎翁作品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有时象征人物身份、影射人物性格,有时作为至关重要的剧情道具,有时又是戏剧气氛的渲染剂。

莎士比亚极擅长描写人物,只需三言两语就能使人物活灵活现,他还经常借用植物的特性和象征意义,来暗示剧中角色的外貌、性格和情绪。比如多次出现的喜剧角色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就经常和廉价的水果、蔬菜联系在一起。《亨利四世》上篇中,福斯塔夫爵士有一句台词:“我的全身皱缩得活像一只干瘪的约翰苹果(Apple John)。”福斯塔夫年近60,鬓发花白,身材肥胖,却爱和年轻人一起花天酒地,干一些荒唐事儿。约翰苹果是个绝佳的比喻,不仅因为它与约翰·福斯塔夫同名,还指代那些在店里保存了一冬的部分脱水的干瘪苹果,虽然还能吃,外表却不怎么吸引人,正如福斯塔夫本人。

福斯塔夫的形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愈加丰满起来,剧中,福德大娘骗他藏进洗衣篓,把妻子扔到水沟里:“让我们教训教训这个肮脏的脓包,这个满肚子臭水的胖南瓜,叫他知道鸽子和老鸭的分别。”莎士比亚把福斯塔夫比喻成南瓜,不仅因为外形相似,还因为他的粗俗无礼——南瓜(pumpkin)与乡巴佬(bumpkin)谐音。

作为童贞和单纯的象征,雏菊在莎翁戏剧中经常出现,以衬托美好纯真的女性角色。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中,莎

士比亚不吝赞美之辞地描写鲁克丽丝在卧房安睡的一幕:“她的另一只手,在床边静静垂下,映衬着淡绿床单,更显得白净娇美,像四月雏菊一朵,在草原吐露芳菲,手上的点滴汗珠,像夜晚花园的露水。”

《哈姆雷特》中,与奥菲莉娅相关的两处描写都出现了雏菊。一处是奥菲莉娅因父亲之死发疯后,在父亲墓前放各种鲜花:“……这儿是一枝雏菊;我想要给您几朵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它们全都谢了。”另一处是奥菲莉娅之死,她戴着由毛茛、荨麻、雏菊和长颈兰编成的花环溺亡在水中。奥菲莉娅带到父亲墓前的植物还有芸香,芸香有后悔和悲伤之意:“这是给你的芸香;这儿还留着一些给我自己;遇到礼拜天,我们不妨叫它慈悲草,啊!您可以把您的芸香插戴得别致一点。”莎士比亚应是由此设计奥菲莉娅特别提到它。

莎士比亚作品中有很多关键情节是借助植物实现的。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假死药,《仲夏夜之梦》中能让人不由分说爱上看见的第一个人的爱懒花汁,这两种道具的灵感都来自现实中的英国本土植物:颠茄和三色堇。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不愿嫁给帕里斯伯爵,因此向劳伦斯神父求助。神父交给她一种假死药,他这样描述这种药的效果:“把这里面炼就的液汁一口喝下,那时就会有一阵昏昏沉沉的寒气通过你全身的血管,接着脉搏就会停止跳动。”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液体是颠茄的萃取物。1597年,杰拉德就在《植物志》里提到,食用几枚小小的颠茄浆果就可能导致昏睡,如果食用过量则会当场死亡。莎士比亚很可能看到了杰拉德的这段话。

成就了《仲夏夜之梦》多层嵌套故事的“爱懒花”是“三色堇”的俗称之一。仙王奥布郎命令小精灵迫克把爱懒花汁滴在仙后提泰妮娅的眼睛里,她醒来后就会狂热地爱

上第一眼看到的人。三色堇的花瓣呈心形,人们时常把它与爱情、爱人和梦想联系起来,传说三色堇本来是乳白色的,被丘比特的箭射中后,因爱情的创伤被染成紫色,在剧中,莎士比亚借仙王奥布郎之口讲述了这则传说。

另外,莎翁常常借助一些具有毒性或死亡寓意的植物来营造神秘、阴郁的悲剧氛围,如曼德拉草、乌头、紫杉和紫罗兰等。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三场中,朱丽叶将要服下假死药,她对即将进入卡布利特家族的墓地满怀恐惧,她的身边将是刚刚被杀的堂兄提波特的遗体,还将听到曼德拉草的尖叫声:“唉!唉!要是我早醒来,这些恶臭的气味,这些使人听了会发疯的凄厉的叫声。”曼德拉草的根有时能长成人形,这种特征让人们对它产生了许多可怕的想法,其中之一就是它被拔出时会发出尖叫声。

《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是莎翁戏剧中气氛最可怖的一部,剧中充满了激情和仇杀。其中一幕是,哥特女王塔摩拉声称她被诱骗到陷阱里:“一个荒凉可憎的幽谷!你们看,虽然是夏天,这些树木却是萧条和枯萎的,青苔和寄生树侵蚀了它们的生机;这儿从没有太阳照耀。”莎士比亚利用懒寄生来渲染剧中的哥特式恐怖气氛,当时人们已知懒寄生会危害它所寄生的植物,而且它的浆果具有毒性,1608年休·普拉特爵士在植物学著作《植物天堂》中提到:“懒寄生蔓延之处,诸多诡异之事发生。”

有时人们疑惑,莎士比亚丰富的植物学知识究竟从何而来。莎士比亚出生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在乡间生活时,他应该对许多野生植物有一定的了解,据说“爱懒花”就是沃里克郡一带对三色堇的俗称。更多知识则来自书籍,尤其是1597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翰·杰拉德的经典植物学著作《植物志,或植物通史》。

## ■动态 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开题会在京举行

4月20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开题会在北京举行。

“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于2017年11月被批准立项,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文飞、汪介之、郑体武、王志耕、刘亚丁、林清华、于明清等多所高校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据刘文飞介绍,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源于2015年末在北京举办的“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位俄国文学史研究者就世界各主要语种的俄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和现状、类型和风格等展开讨论。会后,几位中国学者决定联袂编撰一部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

刘文飞介绍说,俄国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此后二三十年间便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俄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瞿秋白、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构成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占据重要位置的俄苏文学史教科书是布罗茨基主编的三卷《俄国文学史》(蒋路、孙玮、刘江逸译)和季莫菲耶夫主编的两卷本《苏联文学史》(叶水夫译)。到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学者编纂的俄国文学史著作陆续出现,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曹靖华主编的

三卷本《俄苏文学史》和叶水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此次编撰《俄国文学通史》,应该算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史上的第四个阶段。该课题组成员如今都处于人文学者治学的黄金时段,且大多具有俄国文学史著的编纂或翻译经验,先后出版了数十部俄国文学史著或论著,该书出版后,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著作。

在开题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邱运华,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吴晓波、陈建华、张建华、吴泽霖、夏忠宪、李政文、黄政、凌建侯、李志强、侯玮红、王丽丹、王宗琥等就该书编写过程当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专家们认为,多卷本《俄国文学史》的开题是中国俄国文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表明用中国学者的立场和态度关注外国文学史成为可能。大家认为,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应置于世界文学的创作语境下,在写作时注重运用西方文论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应特别体现出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文学史的撰写要结合历史和科学的维度,并兼顾文学性、文化性、学术深度和教学上的广度。(世文)



法国画家维克多·阿尔曼·波尔桑为《维克多·福尔德的牧师》所做插图。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